

绪论

1.1 应用翻译的定义

应用翻译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应用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其中的歧义源于“应用”和“翻译”这两个词自身的歧义性，同时也来自该词语与其他词语结合后所产生的外延意义，如应用翻译研究、应用翻译批评及应用翻译批评标准等。

词义变迁是语言特有的现象。古代文献中的“翻译”与现代汉语中的“翻译”，其含义已然发生诸多变迁。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翻译而起的活动、现象愈加复杂多样，赋予翻译愈加宽泛的含义。例如，在翻译服务行业勃兴、机辅翻译以及人工智能翻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可能并非仅仅指代直接参与不同语言的文本转换行为，如译后编辑、翻译项目管理、翻译软件开发、翻译质量评估乃至翻译批评等，都是“翻译”概念的新时代衍生品，由此也导致人们对于“翻译”概念的把握愈加困难，进而导致在谈论所谓的“翻译”之际各言所是，甚至南辕北辙。在此语境下，所谓的“翻译研究”“研究翻译”“搞翻译”以及各类与翻译联袂的词语，歧义丛生。所以，贝尔（R. Bell, 2005）认为，尽管目前翻译已成为热点论题，但“翻译”一词的歧义性，是导致翻译研究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再加上“应用”一词的歧义性，“应用翻译”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就显得更为复杂。《现代汉语大词典》对“应用”的释义极为简单：（1）使用；（2）适应需要，以供使用，也指直接用于生活或生产。根据第二种释义，给出了“应用文”和“应用科学”两个示例。所谓应用文，指的是“应用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实用性文章，如书信、通知、申请书、公文等”。对于“应用科学”，词典并没有作为具体条目给出释义。但我们可根据《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对“应用心理学”的定义得到相关启示。“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分支，研究如何将科学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应用于解决人类行为



的实际问题。”以此类推到其他学科，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表述。然而，如果我们将应用翻译研究也称之为应用翻译学，那么，应用翻译学是否也是将科学翻译学的发现和方法应用于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呢？答案显然并不那么确定。其实，应用心理学的定义本来就是西方心理学的界定，而在西方翻译研究中，应用翻译研究对应于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其界定模式也遵循了应用心理学的定义。但是，方梦之倡导的“应用翻译研究”以及当下我国对应用翻译研究的界定，与西方的界定并非一致。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也好，“应用翻译学”也好，都超越了西方翻译研究对应用翻译研究的界定。

在我国的译学话语体系中，应用翻译这一概念是在我国 2003 年举办的“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与会者认为“对应用翻译的定位首先是对翻译客体——文本的定位”。这一应用翻译概念是相对于文学翻译而存在的一个文本或文体概念，与“非文学翻译”“实用翻译”“语用翻译”“特殊翻译”等概念同义。显然，这类文本的翻译具有与文学翻译不同的某些特征，通常具有匿名性、信息性、客观性、实用性、时效性等特点。它以传达客观信息 / 意义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目的和功能是应用文体翻译的依据和依归”（方梦之，2019：57）。

这种基于文本类型的应用翻译概念，所涉及的文体类型范围较广，涵盖了除文学翻译之外的各类翻译（包括口译），活跃于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经营等领域，内容涉及政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技术文本、科普读物、旅游指南等。具体分类包括宗教翻译、科技（科普）翻译、商务翻译、视听翻译、法律翻译、新闻翻译、学术翻译、旅游翻译、公文翻译、医药翻译、军事翻译、外交翻译、政治翻译、典籍翻译、文化翻译等。

随着应用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将应用翻译囿于文本类型的翻译，显然已经不够全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应用翻译研究不仅仅探索实用文体文本的翻译，也涉及应用翻译有关的其他方面，从而赋予了应用翻译更为广泛的含义。当然，再广泛的含义也不能脱离“应用”和“翻译”的基本范畴。汉语中的“应用”一词可以用作形容词，由此构成的“应用翻译”即“应用的翻译”，意指应用类文本的翻译；它也可以用作动词，由此构成的“应用翻译”包含两种含义：其一为“应用……于翻译”，意指相关理论在应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的应用，其二为“将翻译应用于……”，意指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应用。因此，一般来说，“应用翻译”作为独立概念，实际上具有两种基本含义：“应用的翻译”和“翻译的应用”。

具体来说，所谓“应用的翻译”，也可作“实用翻译”“非文学翻译”或“特殊翻译”。它与文学的翻译形成对应关系，涉及应用文本的翻译，属于文体范畴的概念。从



文体或者文本类型的角度将翻译划分为文学的翻译和应用的翻译，是现代翻译研究的产物，是文学翻译研究一统翻译研究天下之后产生的反拨，其根本原因是文学翻译不能涵盖所有的翻译。应用的翻译具有文学翻译所不具有的功能。“翻译的应用”，指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具体应用，它使应用翻译这一概念超越了文体文本的范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之间的界线。事实上，赋予应用翻译“翻译的应用”这一含义，不仅拓宽了应用翻译这一概念，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活力，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功能。

提出应用翻译，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系统，在它与文学翻译之间建立起边界以确定自身在翻译中的位置，从而使其从复杂的翻译中区分出来，进行系统的建构与发展，这一系统的建构与发展，既可以视为翻译系统分化的产物，也可以视为应用翻译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总体上是应用翻译自身功能的彰显，是应用翻译自身建构功能的现实化。应用翻译系统的建构，既有利于应用翻译反思自身，有助于其从自身立场出发审视翻译及其环境，也使得翻译研究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更为直观地对应用翻译加以观察与分析。

1.2 应用翻译研究的定义

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应用翻译研究就是针对应用翻译的研究。事实上，“应用翻译研究”和“研究应用翻译研究”，这两个概念不能等而视之。任何人、任何学科都可以从事应用翻译研究，但应用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分支，则具有专业方向的含义，它是一个研究领域、一个研究方向，当然不排除它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或者学科。

如前所述，应用翻译研究的研究范畴，并不囿于应用文体文本翻译研究。作为一个与文学翻译研究形成互补关系的翻译研究分支，其范畴既包含应用文体文本翻译，也包含超越应用文体文本翻译的内容。不过，在进一步探讨应用翻译研究的定义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学界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两种常见认识。其一源自霍尔姆斯的观点。1972年，霍尔姆斯撰写了一篇对后世翻译研究影响深远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在文中，他将翻译研究划分为两大部分：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作为一个纯研究领域，研究只是为了研究本身，与任何自身领域之外的实践应用是不相干的，因此翻译研究有两个目标：（1）描述我们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与翻译和翻译作品有关的现象；（2）建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纯翻译研究当中与这两个目标相关的两个分支可以命名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或翻译描述



(Translation Description, TD) 和理论翻译研究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TS) 或翻译理论 (Translation Theory, TTh)。”(谢天振, 2008: 209) 因此, 他将整个翻译研究学科分为三个部分: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其中的关系是: “翻译描述提供基本数据, 翻译理论在这些数据上建立, 这两者所提供的学术发现又在应用翻译研究中投入使用。”(谢天振, 2008: 216) 由此可见, 在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视野中, 应用翻译研究涉及如何将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的研究: 翻译政策研究、翻译培训研究、翻译辅助研究以及翻译批评。

其二源自 21 世纪以来方梦之积极倡导并践行的应用翻译研究。他所倡导的应用翻译研究, 其实属于应用文体文本的翻译研究。显然, 他超越了霍尔姆斯的“应用翻译研究”概念, 并非只是将纯翻译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翻译培训研究、翻译政策研究、翻译辅助研究、翻译批评等。而且, 方梦之的应用文体翻译研究, 还包含了理论研究, 它“研究应用翻译本体各要素及其间的关系, 研究应用翻译的策略和实践”(方梦之, 2019: 79)。换句话说, 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研究, 不同于霍尔姆斯提出的理论应用性研究, 而是在“专门理论”框架下区分出“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其中, 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特殊研究四个范畴构成应用翻译理论。将应用翻译研究作为具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研究, 极大地提升了应用翻译研究在整体翻译研究体系中的地位, 为系统开展应用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外, 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名称, 有些学者偏爱“应用翻译学”这一概念, 并将其解读为“应用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应用+翻译+学”这样三个层面。黄忠廉、朱灵慧(2017: 10)认为, “就狭义而言, 应用翻译学是‘应用翻译+学’的研究, 专指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应用+翻译学’指翻译学基本理论在翻译领域和非翻译(学)领域中应用的研究。‘应用+翻译+学’, 指其他学科在翻译(学)中应用的研究。”这一解读, 无疑拓展了“应用翻译学”概念, 但是将“应用翻译+学”的研究专指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 还是没有囊括“应用翻译”在当今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中的已然与实然, 无法阐释“应用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学)”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应用翻译研究还是应用翻译学, 传统上都只是将“应用翻译”作为一种文本类型或理论应用研究, 并未能突显出应用翻译研究的特性。本书认为, 应用翻译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应用文体翻译研究, 也不能囿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 它还应该包含翻译如何被应用的研究。就此而言, 作为相对自洽的研究领域, 应用翻译研究不仅要进行应用翻译的产品研究, 即应用文体的文本翻译研究, 还要兼顾应用翻译的过程研究、功能研究、效果研究, 并基于这四个方面建构起相应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 即应用翻译研究理论体系、应用翻译史和应用翻译批评。有鉴于此, 我们将应用翻译研究



简要地界定如下:

应用翻译研究借鉴相关理论围绕应用翻译相关问题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它整体上包括应用翻译理论、应用翻译史和应用翻译批评三个部分;主要涉及应用翻译的产品研究、过程研究、功能研究和效果研究;涵盖应用翻译实践、翻译教育、翻译知识、翻译传播、翻译行业、翻译政策、翻译技术、网络翻译等领域;其主要任务和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挖掘、探索应用文体翻译的一般发展规律及其相关规范;(2)挖掘、探索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具体应用;(3)基于学科交叉,建构具有自身特征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1.3 应用翻译研究的对象

翻译研究传统中有四个基本议题: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何为?任何有关翻译的讨论,都可能针对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话题展开,当然也可能包含全部四个议题。在翻译研究传统中,人们往往聚焦于“译什么”及“怎么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人们关注“为何译”及“译何为”。但是,作为翻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用翻译研究显然不能只局限于这四个议题,否则就无法体现应用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差异化特征,更无必要构建和发展独立自洽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

在上一节中,我们为应用翻译研究给出了一个简要的定义。其实,该定义已经笼统地界定了应用翻译研究的总体对象及具体对象。应用翻译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应用翻译的相关问题”。当然,这一表述是相当笼统的。它无非表明,应用翻译研究的对象非常宽泛,涉及与应用翻译有关的方方面面。任何与应用翻译有关的议题都构成应用翻译研究的对象。

然而,过于宽泛的研究对象并不利于研究体系的建构。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时代,学科边界问题仍然不容忽视。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只是针对那些需要不同学科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并非旨在解构学科边界。如果将研究问题无限的泛化,必然会导致研究的无序和空泛,不仅限制了研究目的和功能的实现,而且也会使得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模糊不清。因此,在明确应用翻译研究总体对象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晰具体对象。

我们认为,应用翻译研究的总体对象包含了应用的翻译和翻译的应用,而具体对象应该与翻译研究的具体对象基本一致。应用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应用翻译研究的具体对象划分为三大领域——应用翻译史(研究)、应用翻译理



论（研究）、应用翻译批评（研究）。之所以在每个领域后在括号中加上“研究”，旨在表明：应用翻译研究不仅要探索译史、译论、译评，同时也要对译史、译论和译评展开研究。作为一门专业或者学科，它需要对研究本身进行再研究。

应用翻译史的研究具体内容有四：（1）史料、史实的挖掘、甄别、归类和整理；（2）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应用翻译所呈现的独特样态（知识形态、翻译媒介、核心概念等）；（3）剖析各历史阶段应用翻译家以及应用翻译家的译著、译述及其贡献；（4）系统探究应用翻译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及人文科技学术知识发展的关系。

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有三：（1）各类理论话语研究，如等值理论、文本类型理论、典籍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理论、功能目的论、生态翻译理论、变译理论、社会翻译理论等；（2）应用翻译具体问题研究，如翻译规范、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职业（行业）、翻译服务、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翻译本地化、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政策（法规）、翻译教育（培训）、翻译认知、应用翻译质量、应用翻译标准等；（3）应用翻译理论体系研究，其中涉及应用翻译本质、应用翻译原则（原理）、应用翻译功能、应用翻译效果、应用翻译价值等，同时也要对应用翻译研究予以再研究。

鉴于应用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应用翻译批评的对象也与文学翻译批评的对象有所不同。应用翻译批评既是应用翻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翻译批评的分支。但应用翻译批评并非只是相对于文学翻译批评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应用翻译及其相关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当然，它首先得益于翻译批评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的发展。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形态，翻译批评总是在不同的主题维度间摇摆，既呈现出时代的差异，又彰显了历史的延续。回顾我国的应用翻译批评史，其间的主题维度呈现出多维视角，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翻译方法与策略、翻译语境。与此同时，也可以归结为四个中心：文本中心、主体中心、读者中心、语境中心。一部翻译批评史，就是一部纠缠于这些维度和中心之间的历史，几乎任何一种批评都可以归类于其中某个要素，所呈现的无非是某种倾向而已。应用翻译批评的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关于应用文体翻译实践的批评；（2）针对与应用文体翻译有关的其他活动或者现象展开的批评；（3）针对各种理论在应用（文体）翻译的应用性研究展开的批评；（4）关于应用翻译批评的批评。应用翻译批评是运用相关理论对应用翻译史及应用翻译理论具体问题的批评。

鉴于我们将应用翻译研究大致划分为应用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的应用研究，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应用的翻译史、应用的翻译理论和应用的翻译批评，以及翻译的应用史、翻译的应用理论与翻译的应用批评。



1.4 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

范畴与对象有所不同。应用翻译研究是一个综合体，它不仅包含三个大的领域，同时也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范畴：(1) 应用翻译文体文本研究；(2) 相关理论的应用研究；(3) 与应用翻译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4) 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研究。

1.4.1 应用翻译文体（文本）研究

将文本划分为文学与非文学，是对文体问题的最基本分类形式。雅各布森（R. Jakobson）认为，文体是区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重要标志（博厄斯-贝耶尔，2011：1）。在翻译研究中，由于涉及原文文体和译文文体，因此，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具有区别于一般性文体研究的翻译学特征。翻译的文体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翻译研究的关注（参见第5章《文本类型》）。方梦之（2019：284）认为，“研究应用翻译，说到底是研究这一特定文体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在两种语言代码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必然要重视其文体特征”。

在翻译研究对文体翻译的探索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如何忠实地再现原文文体。这种翻译受制于原文、忠实于原文的观念，尽管不断地遭受质疑，但在翻译研究中长期占据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文化翻译转向，人们才逐渐摆脱原文文体的桎梏，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目的语中的译文文体。文体翻译研究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主体已经不是文学语篇，而是科技、医学、法律和政务性语篇”（贝尔，2015：13），进而产生了一批针对科技文体、商务文体、广告文体、新闻文体、法律文体等方面的专项应用性研究。但也正因为文体翻译涉及面太广，其操作性不仅较为复杂，而且对于不同文体之间的边界较难界定，在翻译研究的应用性方面有所局限，因此，文本类型研究逐渐开始取而代之。“应用翻译的文本类型枝杈丛生，文类细分是它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也是应用翻译区别于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方梦之，2019：28）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文本类型研究其实是对文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因为，在文体翻译研究视野中，应用文体翻译并没有得到精细化分类，虽然在文体翻译研究中也就不乏文本体裁的分类，但往往流于粗线条，如文学文体、科技文体、公文文体、新闻文体等，而且对文学翻译的关注甚于应用翻译。而文本类型翻译理论，虽然诸多学者对文本的分类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还是突出了应用翻译文本类型的细分特点。传统上依据文体进行的一些粗线条划分方式，逐渐淡出翻译研究视域，如“科技翻译”。据研究表明，“我国科技翻译的研究峰值，处于1986年至1990年……1990年之后，国内以‘科技翻译’为研究主题的



论文呈现锐减态势”(单宇等, 2017: 36)。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体翻译研究从翻译研究领域中隐身, 也并非指文本类型理论是文体翻译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产物。

有学者认为, 划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毫无必要。因为, “仔细想来, 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 讨论时自然有其方便之处, 但是如果循此逻辑, 每换一种具体对象就要换一种理论, 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自然是繁荣了, 但每种理论的‘可适性’也未免太低了吧”(潘文国, 2019: 4)。不过, 这种质疑与争论, 其实并不是对分类的彻底排斥, 只不过是研究立场不同而已。毕竟, 不同时期的翻译研究会更加青睐一些特定的应用文本类型, 例如, 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的政治话语、外交话语、军事话语等, 但应用文体、文本类型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整体, 是应用翻译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 甚至是应用翻译研究永恒的话题, 而且, 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分类问题, 目前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1.4.2 理论的应用研究

谈论理论的应用研究, 涉及两个关键问题:(1) 哪些翻译研究理论成果可以应用, 以及如何应用于应用翻译研究?(2) 来自其他学科的哪些理论可以应用于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很难划分出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应用翻译研究的边界。因为, 任何完备的学科体系都包含了知识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翻译研究学科体系中也必然存在着一些统辖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一般性翻译理论, 即霍尔姆斯所谓的“翻译研究纯理论”或者方梦之所指的“专门理论”。毕竟, “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可说是连理枝, 兴衰与共。……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存在, 任何范畴都存在于某种研究体系之中”(方梦之, 2019: 76)。许多概念和原理为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所共享, 如“翻译等值”“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思维”“翻译地位”“译者身份”“翻译价值”“翻译质量评估”等。潘文国(2019: 3)认为, “由于传统的‘文章’包罗万象, 从经书到诗词歌赋再到各种实际应用文字, 因此, 传统译论讨论的对象并不限于文学翻译, 甚至主要不是文学翻译”, 所以, “在中国传统的译论里, 本来就有着处理非文学翻译的方子”。但这并不能抹杀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各自的理论能产性。诚然, 许多翻译理论都源自文学翻译研究, 而后再应用于其他文体或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例如, 异化和归化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翻译主体性研究、翻译史研究等。同样, 非文学翻译研究也发展出许多可反哺于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 如翻译技术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能力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等。甚至有些概念和理论为应用翻译研究所特有, 如本地化翻译研究、翻译项目管理研究等。

对于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 应该等而视之, 不能片面地以文学翻译研究



或者其他研究来替代应用翻译研究。“特别在科技高度发达、人际交往频繁的当代，铺天盖地的语言产品中应用翻译占了绝大部分。重视和加强应用翻译的研究势所必然，应用翻译研究在译学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方梦之，2019：76）实际上，我国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在典籍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语料库和翻译技术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此领域站在国际前沿。但毋庸置疑，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1）套用国外翻译理论观照本国现实问题时往往断章取义，缺乏系统地汉译国外相关翻译理论的经典著述，进而批判地应用于中国实际翻译问题；（2）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往往昙花一现，缺乏对其进行系统、深入、持续的科学发展与完善；（3）热衷于发掘我国本土传统翻译理论资源，缺乏将发掘出来的有关理论观照当下现实问题做应用性探索；（4）跟风扎堆式地聚焦于某些理论的应用，偏废其他一些理论的应用性研究；（5）应用其他学科理论成果进行翻译研究的多，但是将翻译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少。

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应用研究，不能局限于翻译理论的应用。翻译理论的应用研究，因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框架，在翻译研究领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认同。但本书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应用，本身就涉及跨学科的问题。因此，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应用，实际上涉及不同学科的理论。任何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只要有益于应用翻译研究，能够实现应用翻译研究的功能，都可以予以借鉴与融会贯通。

1.4.3 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

无论将翻译视为交际活动，还是社会现象，它实际上都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其中的诸多问题并非只是语言文体问题，也并非只是历史文化问题。因此，无论是运用语言学或者文化研究，都难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不同于应用文体翻译研究，也不同于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文体或文本类型翻译研究，关注应用型文体，如法律文体、科技文体、商务文体等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聚焦于翻译学科理论或者其他学科理论应用于应用型文本或应用型翻译问题的研究，例如运用文化理论探讨译文，以及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权力、地缘、经济、全球化等因素；而应用型翻译问题所指向的，既不是应用型文本，也不是翻译理论如何应用，而是与应用文本翻译密切相关的活动、现象以及相关要素。

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在许多问题是重叠的。这种重叠的特征，促使霍恩比（M. Snell-Hornby）提出了翻译研究综合法。该综合法分为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将翻译研究分为三类：文学翻译、一般语言翻译、特殊语言翻译；第二个层次指



“基本的文本类型的原型学，涵盖从《圣经》至现代科技用语等这些译者主要关心的对象”；第三个层次列出“与翻译紧密相连的非语言学学科”；第四个层次“指出了制约翻译过程本身的重要因素和原则”，侧重源文本，为设想的翻译提出主要标准等；第五个层次“指出了与翻译相关的语言学领域”；第六个层次“列出了与翻译的某些领域有明确相关的语音要素”（斯内尔-霍恩比，2006：34）。尽管霍恩比（2006：38）一再强调，她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基于原型学，“主要关心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但实质却是基于语言学和文本类型学，根本没有给翻译技术、翻译管理等现代翻译问题留有研究空间，甚至连翻译教学、译员培训也不在其“综合”范围。所以名曰“综合”，其实并没有体现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性。

任何针对翻译的研究，无论是文学翻译研究还是应用翻译研究，都可以简约为翻译产品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从这两个层面出发，巴斯内特（S. Bassnett，2010）曾基于文学翻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研究问题：翻译史研究、目的语文化中的翻译功能研究、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翻译诗学研究。前两种问题类型着重翻译功能研究，后两种类型强调翻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翻译问题研究。这种分类虽然基于文学翻译，但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也属于应用型翻译问题，例如翻译史、翻译功能、语言对比等。

方梦之（2019）在借鉴国外相关翻译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翻译理论分类模式，在“层级功能”的观照下以“一分为三”的理论方式划分应用型翻译问题，并在“一分为三”的基础上增加了特殊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其中，宏观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四：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中观理论关照的问题包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模式；微观研究针对翻译技巧；而特殊研究“作为应用翻译外围研究……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而发展”（方梦之，2019：87），包括了“分类研究以及术语和术语库、翻译技术、本地化、翻译管理等”，并认为，它们“与本体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只有不断地深入研究这些特有范畴，才能推动译学的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方梦之，2019：93）。毋庸置疑，“一分为三”所包含的研究范畴，并非应用翻译研究所特有，也适用于文学翻译研究，甚至可以对翻译研究的理论作整体性关照。而且，强调特殊研究的开放性也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例如，在当下人工智能翻译时代，译者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因为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的应用，往往出现无法确定译者的现象，即“无译者”（translatorless）。在此语境下，谁该为译文负责就成了新的应用型翻译问题。至于诺德（C. Nord）的“忠诚”概念也必然受到新的挑战。因为诺德（2005：166）认为，“忠诚是一个人际范畴，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针对应用翻译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必要区分笔译或者口译。因为，在我们看来，口译的问题主要还是应用型问题，虽然在口译中也会碰到文学翻译问题，例如，在口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说话人所引用的诗歌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口译还是属于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

1.4.4 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研究

就应用翻译研究现状而言，无论国内外都蔚为壮观，已经在翻译研究中占据很大分量。但这只是从研究规模上讲，如果从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来看，其中被掩盖的问题马上就原形毕露了。因为，在应用翻译研究这把大伞之下，人们依据自身的偏好，或者为了各自的目的从事着各自的应用翻译研究，建构各自的概念体系或者理论体系，却并不关心应用翻译整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应用文本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典籍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化翻译研究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却显得相对滞后甚至凋零。

所谓的理论话语研究，就是对理论研究的研究，是一种元理论研究。“一门学问的元理论或元学问是这门学问的自身反思、自我认识，它主要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特征与判别标准（包括这门学问作为一门学问必须具备的条件、必须满足的要求），它所特有的目标、任务、问题、方法，它的根据与确证，它的体系框架，它的功能、功用，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学问的划界、关系。”（刘永富，2002：1）在社会学中，布尔迪厄（P. Bourdieu）提出了“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社会学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躬逢盛世，翻译内容空前繁杂，翻译的数量、品种、影响、辐射力都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翻译教育规模史无前例。我国不但是翻译大国，也是翻译研究大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译学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方梦之，2019：372）在新的研究范式交替涌现、各类理论轮番登场之际，传统的诸多研究问题被搁置一旁，外围研究遮蔽了本体研究，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在喧嚣的语境下显得迷雾重重。因此，有必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应用翻译文体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加强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构建。

❖ 思考题

1. 如何界定应用翻译？
2. 应用翻译与文学翻译有何关系？



3. 如何理解应用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的关系?
4.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用翻译?

📖 推荐阅读书目

- 方梦之. 2019. 应用翻译研究: 原理、策略与技巧 (修订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傅敬民. 2024. 应用翻译研究探索.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根茨勒. 2022. 当代翻译理论. 傅敬民,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刘宓庆. 2019.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北京: 中译出版社.
- 吕俊, 侯向群. 2006.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芒迪. 2014.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应用. 李德凤, 等,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谢天振. 2008.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许钧. 2003. 翻译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杨自俭. 1989.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 中国翻译, (4): 7-10.
- Newmark, P.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